



国际网络杂志
International Web Journal
www.sens-public.org

民主祭典

— 對台灣政黨輪替八年部分公共政策的總結評價

李志德

李志德，1969 年出生在台灣。

現職是台灣聯合報記者，主跑兩岸(台灣和中國大陸)關係和國防部門。

曾出版一本著作：《海風泱泱》(商周出版，2006)，內容為台灣海軍自一九八〇年代初至九〇年代中的建軍備戰，包括對法採購拉法葉艦的歷史。

Democracy Festivals

— A summary evaluation to some public policies
after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Taiwan during 2000 to 2008

LEE, CHIH-TE

Lee, Chih-Te was born at Taiwan in 1969.

Lee is a journalist of United Daily News, a Chinese newspaper, and interested in Taiwan-China relationship and national defense affairs. He is author of *A High Wind At Sea* (Business Weekly Publications, 2006) which is about the history of Taiwan Navy from 1980s to the middle of 1990s, including La Fayette frigate procurement commission corruption.

統獨的虛相和實相

摘要: 在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結束後，中國分裂為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中華民國)，從冷戰時期對峙到今天。中國不放棄統一台灣，用非和平手段也在所不惜；台灣民眾則絕大多數主張維持兩岸分裂分治的現狀。

「統 獨問題」，成為台灣政治的首要議題，但台海情勢牽連著美、日等國的國家利益，想要現在立刻解決統獨之爭，幾乎不可能，除非發動戰爭。但八年來，民進黨政府更多地將兩岸的敵我矛盾，轉用於國內政爭，只因為國民黨主張維持現狀，不需要立即宣告台獨。可以說，八年來的統獨之爭，根本是個假議題。

關鍵詞: 台灣總統選舉 - 台海兩岸關係 - 統 獨意向

First Part, Abstract: In 1949, at the end of Chinese civil war, China separated into "Mainland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Both sides of Taiwan Strait confront from Cold War till now. China won't give up "China Unity", even appeal to non-peace means. In Taiwan, majority people intent to keep status quo. In Taiwan, unity/independent problem became dominant political issues. But situations of Taiwan Strait connected national interest of major powers, for exampl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t is impossible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except war.

Democratic Progress Party (DPP) ruled in 2000. DPP had been used to accuse their competition, KMT (the Nationalist) traitor but political opponent. Because KMT advocate for keeping status quo and no need to announce "Taiwan Independent " right now. "Confrontation of unity/independent" lasted in the very eight years, but we may say that is indeed a "fake issue".

Keywords: President election of Taiwan ; Taiwan-China relationship ; intention of unity/independ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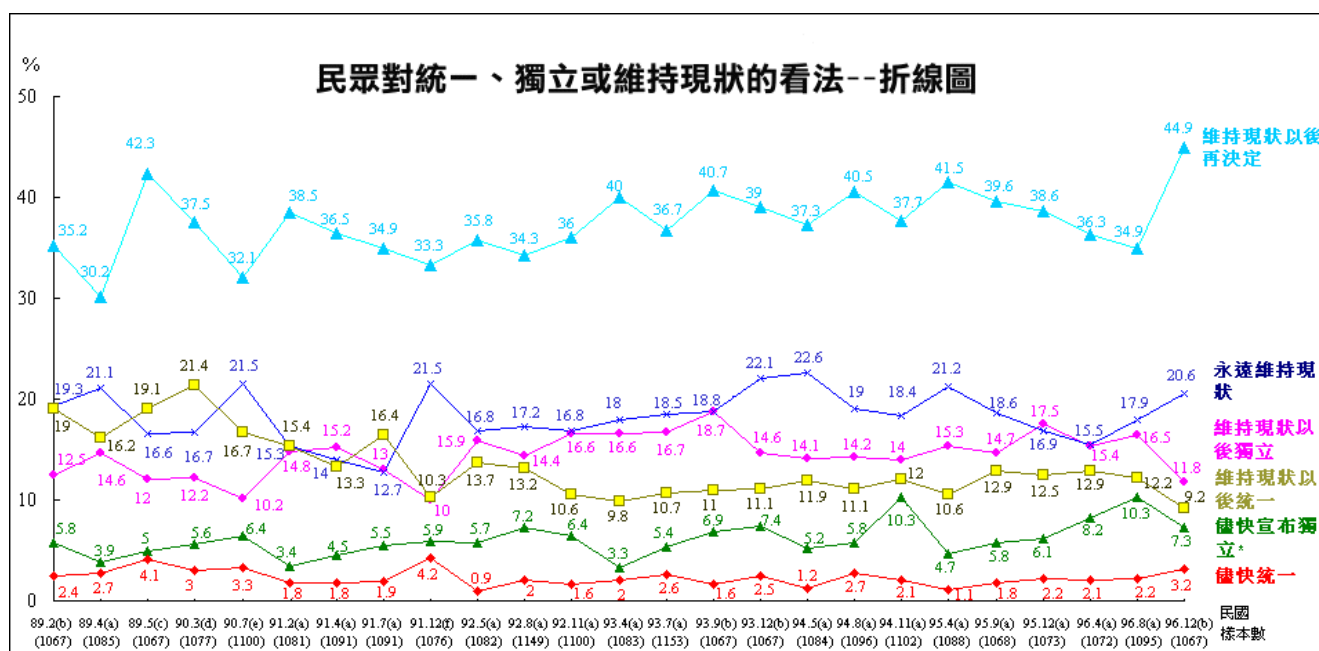
從台灣政治的根源問題之一：兩岸關係開始好了。

台灣海峽兩岸到今天處在分治狀態，這是一九四五年起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內戰的延續，這場內戰在一九四九年國家分裂後暫時停止。本文對於引用複雜的國際法見解討論兩岸關係毫無興趣，也不認為其中任何一種法理邏輯有助解決問題。因此本文的立論，只立足於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現況」：

兩岸各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土地、人民、主權俱全。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主權及於台灣，不放棄「收回台灣」的權利，其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在內，成為兩岸衝突的根源。

中國之所以能夠無視海峽兩岸實際上是兩個國家的現況，是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以及所有歐、美主要國家，都給予中國正式的外交承認，相對地不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這固然是一種集體漠視，但也是這些國家追求國家利益的理性選擇。我不明白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為什麼要為這種集體謊言焦慮至此？焦慮到需要花大筆的外交經費，以收買一些貧窮國家的貪汙政客的方式，換得一些無效的反擊？

一百公里寬的台灣海峽分開了兩個國家，它同時也被利用作為台灣內部政黨鬥爭的主要戰線。在台灣追求民主化的這幾年，這條戰線被稱為「統獨問題」，或者「國家認同問題」，這個問題的基本假設是如此，台灣人民對國家未來，存在「獨立」和「與中國統一」兩種選項，多少學者論辯、民意調查，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下是台灣政府部門一項長期的民意調查統計結果：



(取自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

因為長期用同樣的問題、同樣的抽樣方式做民調，這項結果可說有相當的參考價值。而這種「儘快統」、「儘快獨」、「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後求統」、「維持現狀後求獨」的分類，也一直是討論台灣前途問題的慣用架構。但這果真是一個有效的架構嗎？

先從民調結果來分析：

結果一：贊成「永遠維持現狀」，或者「相當一段時間維持現狀」(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的民眾，約在百分之四十五到六十五之間，永遠佔絕大多數，大半時間都在百分之六十左右。

結果二：主張儘快改變現狀，就是選擇「儘快宣布統一」或「儘快獨立」的受訪者，其總和絕大多數都在百分之十以下。

結果三：「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和「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的總和，約在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之間。

我認為，「結果三」原本就是從「結果一」中強行切分出來的，因為「維持現狀，以後統一(或獨立)」的選項，既不能讓受試者表達「『以後』是『多久以後』」，也不能呈現統一或獨立的「條件」究竟是什麼。例如「中國有多黨政治了，就統一」、「中國軍事壓力擋不住，就接受一國兩制」，或者「美國如果能承諾絕對保護台灣，就獨立」、「如果中國民主化，應該就能獨立了」.....等等。

「時間」和「要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群人顯然表達了某種條件式的觀望態度，雖然他們心中對兩岸的終局安排有偏好，但如果條件不能達成，決定統、獨的時間就會不斷延後，這就使得他們回答所代表的意義，實質上趨近等同於結果一。

花了這麼多篇幅，接下來終於可以把「結果一」「結果三」相加，得出的結果是百分之七十到九十五的台灣人，能夠接受、認同，或者至少願意與兩岸現況妥協。我認為上述這段論證恰恰說明了，在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意向中，就算儘管調查者再怎麼設定、強分「統」、「獨」，現階段它都是一個實質意義不大的議題。

台灣人民是清醒的，因為百分之九十民眾對台灣前途的認知，和國際情勢是一致的。冷戰時期，台灣是美國布署在西太平洋的「反共前哨」。九零年代，冷戰雖然結束，但美、中兩國仍然存在矛盾和競爭，台灣在冷戰時代的價值，就這麼變相地被保留了下來。

可以這樣講，台灣的安全，有一大部分的架構在美(加上日本)、中的權力對抗之間，兩強的頡抗，或許會讓台灣島或左或右地飄流著。只要美中對峙的根本結構不變，中華民國在台灣現狀就能維繫。台灣人自己可以著力的部分極為有限，任何積極改變現況的嘗試，都會被美、中兩大集團壓制。百分之九十以上台灣人認知的，就是這個事實。

這樣論述，絕不代表作者認為台灣面對兩岸關係真的「無可如何」，但除了像一枚過河卒子，使盡全力鞏固現有維繫台灣安全的國際架構，強化自己的軟、硬國力，讓中國不願付出武力進犯的代價外，作者找不出有第二條能夠廣為台灣人民接受的

生存之道。因此，關於台灣的前途，原本應該是共識度很高的議題，為什麼這八年會變得愈來愈分歧？

活躍在檯面上的政客不會不知道，操作立即的「統一」或「獨立」都是對現行國際權力架構的衝撞，代價很高，成功的機率幾乎是零。但特別是陳水扁政府，執政末期幾乎無時無刻不把統、獨議題放在嘴邊。這麼做的主要目的，是把對外關係轉用作內部政治鬥爭，因此，一旦在野黨對外交、國防政策和大陸政策有不同看法，一概都被主政者放在「敵我矛盾」的脈絡下處理，朝野政黨既然是敵我，而非競爭者，那就是我活你死，不會有任何論辯的空間。

例如從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七年，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為了對美國三項軍購案纏鬥不休，爭論的詳情不在這裡討論，但朝野政黨爭議的重點不像一般國家，鎖定在項目、用途、價格或取得方式，而是一種「全有全無」的角力，這也難怪民進黨政府官員和宣傳機器會把「愛台灣」、「台灣要贏」這類口號掛在嘴邊，同意我的就是「愛台灣」，否則就是不愛台灣，當然就是人民公敵。

到了民進黨執政後期，這一套宣傳公式從外交、國防和大陸政策領域向各處蔓延。甚至到了二〇〇六年，陳水扁總統及妻子吳淑珍涉入貪汙案，台灣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行動，這樣的抗議行動，在執政黨人的口中，同樣被論述成意圖顛覆台灣安全。

統獨是虛假議題，但這卻不代表中華民國可以沒有國家戰略。國共內戰失敗的蔣中正，撤守台灣為的是反攻大陸，但在他一九七五年逝世之前，只在一九五九年開始的「大躍進」或者稱「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和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革，有過兩次短暫軍事反攻的機會，但都在美國的干預下被迫停手。要論衝撞台海國際秩序，蔣介石恐怕才是第一人，而且不像陳水扁，老蔣喊反攻大陸，搞的可是真的！

父死子繼，到了蔣經國時代，兩岸熱戰基本上已經結束，對大陸的政策轉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軍事反攻大陸口號雖然不變，但事實上已經放棄，在蔣經國治下，台灣的軍事力量只用於自保，進攻的一手，更多交給「軟國力」來擔綱，力求

和平演變中國，口號喊的是民主，但更多靠的是起飛中的經濟，這也是中華民國政府操作國家戰略最「知行合一」的時代。更重要的是，作者認為這條路線到今天仍然基本正確。

陳水扁執政八年，對於如何應對中國，卻始終沒有一套明確、完整、可操作的戰略，不能有效應對來自中國的壓力，台獨公投成功了又如何？一個更嚴峻的問題是，台灣的經濟起飛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時間若合符節，兩者彼此需要，所以造就了七零年代到九零年代兩岸的穩定和平關係。

但兩千年之後，台灣和中國民族主義同時崛起，前者大部分轉化為台獨建國運動；後者在經濟的支持下，準備開始洗雪百年恥辱。兩岸關係的主調，開始從經濟上的互補合作，轉為民族主義的相互碰撞。

可以這樣說，如果中國經濟、軍事力量的發展趨勢不變，台灣十年後處境的嚴峻程度，僅次於一九四九年，當時美國認定國民黨不可能守住台灣，因此準備放棄國民政府，這項政策直到韓戰爆發才被迫改變。未來十年會怎麼樣，即將由下一任總統，也就是馬英九或謝長廷其中一人的團隊決定。但這些議題，全部都在內部政爭中消耗殆盡，偏偏就算用於內部政爭，也絲毫沒有論述，只有口號和文革式的批鬥，台灣國家戰略面臨全盤劣質化的險境。

在陳水扁執政的八年間，民眾「作為一個台灣人」的意識是強化了，但未來這群「台灣人」要往那裡去？要如何保住自己？如何和中國相處？這個未來的圖象卻愈來愈模糊。在虛實倒錯的台灣政台，統獨是虛，政客喊得樂此不疲，國家生存危機是實，但為了選舉利益，低能化的政治人物，卻沒有人敢把它談清楚。

二

在「轉型」間消失的「正義」

摘要: 國民黨的長期執政導致的腐敗，是民進黨得到民眾支持，得以在二〇〇〇年大選勝出，創造政黨輪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自許終結了一個五十年來一黨獨大的威權政府，「轉型正義」成為民進黨執政下的顯學。但執政八年後，由於政治路線的錯誤選擇，民進黨政府連完全操之在行政權、難度最低的「轉型正義實踐」都幾近繳了白卷。

關鍵詞: 台灣總統選舉 - 轉型正義 - 拉法葉艦佣金弊案

Second Part, Abstract: In 2000, Taiwan underwent its first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from the Nationalist to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One of major reasons is the Nationalist's serious corruption that origin from fifty-year governance.

DPP always publicity "We ended the dictatorship", at the same time "transitional justice" became the prominent political issues during 2000 to 2008. But at the very end of DPP ruling, about "transitional justice", what this government accomplished are far less than their political propaganda.

Keywords: president election of Taiwan ; transitional justice ; La Fayette ; frigate commission ; corruption

國民黨的腐敗，是民進黨得到中產階級民眾支持，得以在二〇〇〇年大選勝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自許終結了一個五十年來一黨獨大的威權政府，「轉型正義」成為民進黨執政下的顯學。但執政八年後，由於政治路線的錯誤選擇，民進黨政府連完全操之在行政權、難度最低的「轉型正義實踐」都幾近繳了白卷。

吳乃德教授對「轉型正義」的詮釋如下：

「民主轉型之後，新的民主政府應如何處理過去威權政府對人權的眾多侵犯，對無辜生命的凌虐、甚至屠殺？具體地說，對威權政府中發號施令的高階層人士，我們應如何加以處置？對主動從事或被動服從指令而侵犯人權的情治、司法人員，我們應該如何對待？.....而另一方面，對眾多遭受生命、自由和財產損失的人，我們又

應當如何補償？」(引述自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收錄於「歷史與現實」一書。)

上述的文字，是對於「轉型正義」的一般界定。但本文使用「轉型正義」一詞，指涉的「不法」，範圍遠小於上述的界定範圍，甚至外表看來，它只是一起普通的貪汙罪，但作者之所以放膽借用「轉型正義」這頂大帽子，乃是因為不論牽涉範圍大小，這些不法事件都有個共同的來源：一個威權獨裁，或者權力不受節制的政府。

就像世界其它經歷民主轉型的國家一樣，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之際，國民黨在台灣政治的史頁上，留下了一道一道威權刮擦的痕跡。這些案件又可以分成兩類：一是已過刑法追訴期，必須以特別法進行補償、賠償或究責的，例如二二八事件、國民黨的不當黨產和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等。第二是仍在刑法追訴期內，甚至是政權輪替之後才爆發的案件。本文探討的對象，將更多集中在後者，必要時才旁及第一類案例。

我們就以「拉法葉艦採購佣金案」、「尹清楓命案」和「國安秘帳」三起堪稱指標的案件，檢視民進黨政府實踐「轉型正義」的成績。

「拉法葉艦採購佣金案」和「尹清楓命案」，都與一九九〇年左右台灣對歐洲，特別是法國的軍事採購有直接關係。在此之前，美國是台灣大部分主要武器系統唯一供應來源。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西方主要國家集體限制軍工產品、技術銷入中國，法國因此把軍品出口目標轉向台灣，當時台灣正值新舊武器汰換的階段，台、法兩國簽下兩筆重要的軍火交易合約：六艘拉法葉級巡防艦和六十架幻象 2000-5 型戰鬥機，後者附帶一千五百枚空對空飛彈。依當時幣值，兩者合計約四百四十億法郎。

目前確定的是拉法葉艦的交易案中，曾經出現大筆佣金，台灣方面涉案人包括軍火仲介商汪傳浦和海軍上校郭力恆，至於這些佣金是不是包括幻象機採購，或者幻象機另有一筆，目前不可考。台灣司法機關目前也沒有對幻象機是不是也佣金，發動任何司法調查。

尹清楓命案則發生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九日，台灣海軍司令部武獲室主任尹清楓上校遭殺害後棄屍台灣東部外海，尹清楓當時主管海軍三個重要的對歐採購案：法國拉法葉艦、義大利海測艦和德國獵雷艦，殺機因何而起，至今沒有定論，但二〇〇〇年之後，尹清楓命案更多地被當局與拉法葉佣金案金連繫在一起，收受佣金者，也被暗示就是殺人者。

很巧合地，上述兩案，都曾經在陳水扁總統擔任國會議員時，被他用做問政材料，特別是尹清楓命案，陳水扁在擔任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時，七次要求國防部向國會提出專案報告，當時的陳水扁，在尹清楓命案上掙得了十足的正義形象，因而在陳水扁就任總統後，輿論理所當然期待尹案因而能有所突破。

「國安秘帳」，指的是國家安全局掌管的一筆冷戰期間來自美國援助的基金，這筆錢從來不曾進入政府預算、決算體系，國安局在沒有立法和審計部門監督的情況下，利用基金孳息發展秘密外交：主要對美國及日本。但在此同時，主管這筆基金的出納組長劉冠軍，也挪用基金炒作股票。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後，劉冠軍捲款潛逃，他的罪行及這筆秘密基金同時曝光。國安秘帳案，堪稱國民黨五十年的統治下一昧求便宜行事，視法律為無物，權力不受節制的縮影。

除了逃脫的劉冠軍外，國安秘帳唯一被起訴的公務員，會計長徐炳強在二〇〇六年九月判決無罪確定，無罪的重要理由，是徐炳強是接受「上級」命令行事「縱使違反會計法規，值得非議，但並無侵占事實，亦無犯罪故意可言。」，那「上級」呢？徐炳強的上級是局長殷宗文，殷宗文的上級是總統李登輝，這兩人自始至終，完全沒有受到司法追訴。

一名少將、一名上校被起訴，前者無罪，後者在逃，這就是國安秘帳案的結果。

情況更糟的是尹清楓命案。儘管經歷政黨輪替，尹案至今完全沒有進展，陳水扁當時在國會殿堂上言之鑿鑿的「真相」，到了檢方手上，全都成了無可稽考的傳聞，兩位在監察院調查報告中被指控參銷毀證據的軍官，竟然能一路升到高階將領，其中一人至今還在位。

比起另兩案，拉法葉佣金案較有進展，二〇〇五年年底，台灣向瑞士取回了軍火商汪傳浦和涉案軍官郭力恆的海外帳戶資料，證明拉法葉採購確實存在非法(就台灣法律及行政規章而言)佣金。但除了汪、郭以外，拉法葉佣金案的追訴對象，就始終鎖定在當時承辦本案的一名中將、兩名少將和數名校官，而且審判拖得極長，二〇〇一年起訴的案件，至今還在一審準備程序中，其中一名被告已經因為老病蓐侵而身故。

檢察官描繪了一個怪異的「犯罪圖象」：就是這些被告聯手灌入十多億法郎的佣金，動機似乎「純屬貪?」，受益者也只有他們自己，因為這些人的「上級」，海軍總司令、參謀總長和總統李登輝，同樣無人遭到追訴。

尹清楓命案和拉法葉佣金案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司法追訴都侷限在中、高階公務員身上，而明顯主導全案的政治人物，卻個個全身而退。一篇評論甚至用「畏強凌弱」批評檢方的惡劣作風，雖然講的是國安密帳，但移到拉法葉案，一樣適用：

「檢方在偵辦國安密帳案時，選擇性地割裂偵辦，且蓄意迴避前總統李登輝的涉案情節，如今已經使此一高達美金七百五十萬元的重大貪瀆案件演變成無頭公案。國家公帑無法追回，國家綱紀難以整飭，極高層涉犯罪者逍遙法外，在在都是檢察官嚴重失職的惡果。」(引述自聯合報二〇〇四年九月三十日社論)

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小官大辦、大官小辦、高官不辦」這般惡劣的多重標準？又是什麼使社會在政黨輪替之初，對民進黨政府「清理前朝積弊」的期望完全落空？我認為根本因素出在陳水扁在「公民政權」和「本土政權」兩條路線交錯間雜之際，一開始就選錯了邊。

開頭說過，中產階級對清廉政治的想望，是陳水扁能在二〇〇〇年大選勝出的重要推力，他們認為民進黨完全沒有國民黨執政的包袱，理所當然可以大刀闊斧地清理國民黨時代的不法弊案，而當時的陳水扁，正好符合這個形象，我自創一個「公民政權」的名詞，形容這樣的授命。

但另一方面，標榜「本土」(其實是閩南)當家作主，走漸進台獨路線，反對中國統一的政治期待，也匯集到陳水扁身上，這股力量被稱為「基本盤」，雖然人數不如中產階級，但卻是能為候選人募款(或自己捐款)、拉票、辯護、奔走的主力部隊。

陳水扁政權在組成之初，就兼有「公民」和「本土」兩種元素(當然，這兩種元素會有交集)，兩種元素，代表兩條路線。偏偏問題在於，「本土」路線不是民進黨所獨有。事實上，國民黨在李登輝能夠完全主導後，約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總統大選前後，就確立了以李登輝為核心的「本土路線」，換言之，「本土」這塊政治資源，是由國民黨的李登輝系統人馬和民進黨共同分享的。

二〇〇〇年三月民進黨勝選，當年中國國民黨以敗選究責為藉口逐出了李登輝，李系組成台灣團結聯盟，訴求最極端的急獨路線，隔年立委選舉，民進黨得票率百分之三十三點四，台聯拿下百分之七點八的選票，成為民進黨不可缺少的側翼。政治上和李登輝結盟，相對地就使民進黨政府處理國民黨積弊時愈來愈手軟。

甚至，回頭來看民進黨這幾年不斷喊出的「轉型正義」，為什麼人民對此愈來愈冷淡？因為，你如何能夠一方面以此攻擊連戰、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另一方面卻和威權體制下最大的受益者李登輝結成同盟？再者，要想大規模地追究極權統治的責任，需要透過立法，的確受限於國民黨在國會的多數，有一定的難度。但如果連弊案偵辦，這種完全操之在行政權的舉措，都會出現如拉法葉、國安密帳一樣的「不正常切割」，人民如何能相信，陳水扁政權的「轉型正義」不是廉價的選舉口號？

許多親綠營的政治評論者，對「坐擁黨產」的國民黨竟然能在二〇〇八年國會選舉中大勝，頗有「正義淪喪」的感嘆，但他們看不清的是：台灣人民不是不期待正義，而是已經不相信民進黨政權還能夠帶來正義。

陳水扁在選擇與李登輝領導的所謂「本土」勢力結合的那一刻，就已經註定在「公民路線」上徹底失敗。二〇〇〇年人民對「正義」的期盼，就在這段「轉型」中隨風而逝.....

三

誰的檔案？誰的國家？

摘要: 二〇〇八年的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陣營的候選人，不約而同地指控對手曾經在戒嚴時期為情治機構工作。這使台灣人民意識到，政黨輪替八年來，民進黨不僅完全承接了國民黨建構的情治機構，在此同時，包括國安局、調查局等的單位所擁有的，件數接近天文數字的檔案，也轉為民進黨政府所用，一如它們以往對國民黨政府提供的「服務」。

關鍵詞: 台灣總統選舉 - 檔案 - 白色恐怖 - 情治機關

Third part, Abstract: In campaign of 2008 president election, candidates of the Nationalist and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both accuse their competitor worked for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n the era of "White Terror". From these oral attacks Taiwanese people aware ALL the intelligent bureaux construction in the era of "the Nationalist dictatorship", are still "good aids" to DPP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millions files reversed at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Bureau of Investigation...etc. became the best weapons to fight with political competitors just like they "serve" the Nationalists before.

Keywords: president election of Taiwan ; file ; dossier ; white terror ; intelligence community

總統大選前，發生了兩起新聞事件。

第一案的主角是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台灣「壹周刊」連續兩期爆出謝長廷在國民黨執政的戒嚴時期，是法務部調查局的「諮詢對象」，俗稱「線民」。報導稱，在民進黨組成前後，謝長廷將「黨外勢力」的動態向接頭的調查員謝育男透露，使國民黨政府可以早一步掌握反對人士的動態，包括組黨在內，並預作因應。

這則報導最有力的證據，是謝育男具名證實，但謝長廷究竟是領有調查局津貼的「消息來源」(source)，或是不拿錢，單純做意見交換的「接觸對象」(contact)？目前並不清楚。

另一起案件，是國家安全局前第一處副處長蕭台福，他在退休後寫了一本關於情報理論的書，被控洩露國家機密。但在檢察官主持的偵查庭上卻赫然發現，與蕭台福著作雷同的「機密教材」，卻因為國安局自己作業烏龍，早已「自動解密」。

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各機關應從二〇〇三年十月一日起重新核定機密，「屆滿二年尚未重新核定者，自屆滿之日起，視為解除機密。」但控訴蕭台福依據的「機密」，公文重新核定的時間是九十四年十月，已經超過時效，依法應該解密。

蕭台福接受採訪時估計，國安局內像這樣逾期核定，依法應該解密的案件，可能高達數十萬件，佔國安局一千萬筆檔案的百分之五。這批檔案，包括了不少國內政情的蒐報資料，一旦解密公諸於世，引發的震撼，將會非常可觀。

「情治檔案」，是這兩案的共同之處，不管是無形的，在謝育男腦袋裡的檔案；或者是有形的，在國安局檔案庫裡的陳年卷宗。

情治機關的檔案，留存了國家機器統治手段的第一手紀錄，因此任何一個宣稱實踐「轉型正義」的政權上台，檔案解密，都是一個必須正面面對的問題。最好的例子，莫過於一九八九年，東西德統一時，新政府成立了「高克機構」將東德國家安全部所收集的所有案卷、卡片、電話監聽紀錄和被撕碎的一萬多袋資料全數公開，任何人都可以申請查閱，了解自己在東德政權下，被監控，出賣的紀錄，數百萬人的紀錄被公開，包括政客間利益交換的資料在內。

民進黨執政之後，的確針對檔案做了部分解密，其中規模最大，較有系統的，要算是「二二八事件」和「美麗島事件」檔案了。但後者的「政治定性」比較清楚，可以「再論述」的空間不多，所以就集中談「二二八檔案」。

相對於「歷史文件」，另一種性質的檔案，本文且將它稱為「政情檔案」，它記載的事件，大多發生在二、三十年之內，檔案內相關人士大多健在，甚至仍在社會、政界和商界活動的人士。這類檔案內容，牽涉到檯面上政黨、政客的政治利害，一卷檔案的揭露，有時甚至影響一次重要選舉的勝敗。在此同時，情治機關也不會樂見因為檔案全盤公布，使社會大眾了解他們收集情報的方式、內容和其中可能的不法手段。

「高克機構」的檔案之所以震撼兩德政治、社會，我相信就是因為其中許多的檔案吸引記者的程度，更甚於吸引史學家，台灣的「政情檔案」也一樣，但民進黨政府自二〇〇〇年執政以來，對這類檔案解密、公開的政策、作法，完全看不到它們自己宣稱的進步性。

例如，陳水扁在二〇〇六年十月十日國慶談話中，提到將軍情局人員在美國謀殺記者劉宜良的「江南案」檔案移轉檔案局，但時隔十六個月，目前江南案檔案被公開的情況如下，下圖是在國家檔案管理局網站上的檢索結果：

六筆檔案，只有第四筆監察院的部分已經公開，來自總統府的三筆中，看來似乎是最重要的一筆「駐美外交機構來電抄件」至今諱莫如深，連兩卷「國際新聞報導」都不知何故地沒有公開。陳水扁好說大話，只空談不做事的例子，再多一樁。

如果把「高克機構」作為一種「理想型態」，台、德兩國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兩德統一後，東德政府完全結束，所屬的國安部也跟著解散，完全公開檔案，對西德政府統治權不致於傷筋動骨。

(即令如此，高克機構成立十年後，西德總理柯爾還是控告了該機構，因為一個稱為「希望」的組織，希望透過高克的資料，特別是竊聽的電話錄音，揭發柯爾領導的政黨接受政治捐款的醜聞內幕。柯爾則主張，這些秘密檔案都是以非法竊聽等手段收集的，公開這些材料將損害他的尊嚴。)

相對地，兩千年政權輪替之前，國民黨政府治下，有法定職權對國內進行政經、治安情報蒐集、彙整的機構，包括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調查局、憲兵司令部和海岸巡防署。政黨輪替後，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內政部移民署也獲得司法警察權，主要負責非法移民調查。

由此可見，民進黨執政八年來，完全承接了國民黨建構的情治機構，規模有過之而無不及，對外界呼籲的精簡、整併繳了白卷，兩千三百萬人的小島上有超過十萬名具有廣義身分的警察。在此同時，包括國安局、調查局、海巡署(前身為警備總部)

和警政署這些成立半世紀以上的單位所擁有的，件數接近天文數字的檔案，也轉為民進黨政府所用，一如它們以往對國民黨政府提供的「服務」。

黨、政分立原是民主國家的重要原則，「情治」又是政權中最敏感的一個部門，但民進黨執政八年，有太多例子可以證明民進黨政府不斷借助情治機關的權力進行政黨競(鬥)爭，我們可以從現任行政院副院長邱義仁的職位轉換上，這八年來，他三度出任國安會秘書長或副秘書長，除此之外，他的名字還經結常和「民進黨選戰總操盤手」連在一起，他自己及民進黨政府，對此也從不否認。誰能保證邱義仁在國安會秘書長任上所獲悉的反對黨私密情報，不會被用於民進黨選舉；甚至沒有人知道，邱義仁有沒有在秘書長、副秘書長任內參與過民進黨選務會報。

很難想像，一個打著轉型正義旗號的政黨，黨政不分的作風會惡劣至此。另一個例子，是二〇〇五年年底縣市長選舉時，偵辦拉法葉艦採購佣金案的檢調機關，也正好接收了瑞士政府提供的佣金帳戶資料。不料這些資料接收不久，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也「適時」收到一批由「愛國台僑」提供的佣金帳戶資料，黨團動員多位立委，一連數日開記者會攻擊國民黨，有些委員從政以來從來不曾過問拉艦案，記者會上只能照本宣科，立委徐國勇、賴清德甚至因為把根本沒被起訴的承辦軍官說成「貪汙被告」，遭當事人一狀告上法庭，面臨天價求償。

他們的資料，是那裡來的呢？

再看這次選戰，民進黨公布了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的綠卡號碼，希望連繫到馬英九具有美國國籍；壹周刊則爆出謝長廷可能是線民的不堪過往。這些資料，又是那裡來的呢？因為什麼目的而曝光呢？

看著選舉這樣打下去，腦子裡忍不住浮出一個惡劣的圖象：難道台灣的選舉，竟有相當部分的議題，是由情治機關設定嗎？釋出馬英九的綠卡號碼，可以向綠營表態效忠；偷渡謝長廷的線民報告，可以充任國民黨的側翼打擊。因而，無論政黨如何輪替，憑著這些檔案，躲在暗處的胡佛，或「胡佛們」，才是永遠的執政黨。

這是誰的檔案？這是誰的國家？